

研究论文
Articles

网上社群对中文变体的 语言态度研究

An Online Community-based Language Attitude Study on
Chinese Varieties

林凯祺

(LAM Kai Chee)

KAMILA Ghazali

摘要

本文采用间接法（配对实验）和直接法（问卷调查），研究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古晋市网上华裔社群对四个中文变体的语言态度。这四个变体为标准华语、口头华语、闽南语（古晋口音）及粤语。总 403 位受试者参与了调查。配对实验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标准华语和粤语在地位价值和共聚力维度皆获得较高且正面的评价，而闽南语和口头华语在共聚力维度的评价则比地位价值维度的评价来得高。

关键词：语言态度、古晋、网上社群、中文变体、配对变法、问卷调查

林凯祺 Universiti Malaysia Sarawak, Centre for Language Studies. E-mail: kclam@cls.unimas.my
KAMILA Ghazali Universiti Malaya, English Department,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E-mail: kamila@um.edu.my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12

Abstract

Using the indirect method (matched-guise test) and direct method (questionnaire), this study was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language attitudes of the online Chinese community in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on four Chinese varieties. These varieties were Standard Mandarin, colloquial Mandarin, Kuching's Hokkien and Cantonese. A total of 403 respondents took part in this survey. Results from the matched-guise tests as well as questionnaires show that Standard Mandarin and Cantonese are rated higher and more positive for both the dimensions of status and solidarity, while the ratings for Hokkien and colloquial Mandarin are more prominent in the solidarity dimension.

Keywords: language attitudes, Kuching, online community, Chinese varieties, matched-guise test, questionnaire

一、研究背景

语言态度指的是某一社会或群体对某某语言的态度，如他们认为该语言有没有吸引力、好不好听、容不容易学上手等 (Ghazali Yusri, Nik Mohd Rahimi, & Parilah M. Shah 2010: 17)。不少研究 (如 Edwards 1983; Young 2003; Ithemere 2006; Dailey, Giles, & Jansma 2005) 说明了多语社会为语言态度研究提供合适的平台。这是因为在语言碰撞的过程中，免不了使到一个语言社群给另一个语言社群创建出独特的印象。尽管社会语言学家认为所有语言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作为广大语言使用群的普罗大众才是一个语言未来发展的最终决策者 (郭熙 2004)。

马来西亚是个由多元民族组成的国家，当中主要包括了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以及当地土著。马来西亚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华族人口占了马来西亚总人口约四分之一 (22.56%)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2010)，这表示进行与华族相关的研究是具有其意义的。

本文立足于语言态度这个大方向，研究网上社群对马来西亚四个中文变体的语言态度。这里的“网上社群”指的是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古晋市的华裔居民，而研究的四个变体为马来西亚标准华语 (简称标准华语)、马来西亚口头华语 (简称口头华语)、闽南语 (马来西亚华裔俗称之为“福建话”。详见曾少聪 2002) 和粤语 (马来西亚华裔俗称的“广东话”)。本文

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为配对变法 (matched-guise technique) 及问卷调查。Lambert 等 (1960) 所提出的配对变法及其后来的改良版本 (见 Zhang 2009; Cavallaro & Ng Bee Chin 2009; Young 2003; Campbell-Kibler 2008; Lindemann 2003) 都是建立研究方法时的主要参考来源。

之所以选择研究古晋市, 原因之一乃该市从早期即几乎汇集了所有在马来西亚常见的主要华人籍贯 (见 Tien Ju-K'ang 1953: 2)。表 1 展示的是 2000 年古晋市华裔各籍贯人口的数据。

由于古晋市有着如此多元的华族籍贯, 因此走在街上时常可听到各类华族方言。尽管客家人是古晋市的最大籍贯, 然而该市的共通方言却是闽南语, 这现象和 Tan Chee Beng (2000: 47) 所报告的是一致的: “闽南语在马来西亚大部分地区都是华人的共通语, 尤其是在……砂拉越。” 追根究底, 福建人在砂拉越定居已有较久的历史, 他们的分布也较广 (Tan Chee Beng 2000: 47), 喜欢聚居城镇 (Ting Su Hie & Puah Yann Yann 2010: 3), 因此闽南语在古晋市的广大流通也就不言而喻。

大体而言闽南语、口头华语和标准华语是在古晋市常听到的三个中文变体。本文所谓“标准华语”是和“口头华语”相对

的。标准华语是向中国大陆的普通话靠拢的, 我们可把它看成是无论在发音、词汇或语法上都符合 (或接近) 规范的变体。在马来西亚, 受过专业语音训练的中文电台播报员可说是使用标准华语的代表之一。口头华语则

表 1: 2000 年古晋市华裔各籍贯人口

籍贯	人口	比率
客家	90,959	48.17
福建*	30,817	16.32
潮州	25,247	13.37
福州	18,073	9.57
兴化	6,704	3.55
广东	6,178	3.27
海南	4,658	2.47
福清	304	0.16
广西	227	0.12
其他	5,656	3.00
总人口	188,823	100.00

* 实指闽南人。本文沿用马来西亚华裔对该族人的俗称“福建人”。详见曾少聪 2002。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2000)

是相对而言较为随性、在发音、词汇、语法上较不规范的变体。反映在语音上，口头华语的声调趋平，更明显的是说话者常不刻意地区分平舌音(z、c、s)和翘舌音(zh、ch、sh)，说话时也很少或几乎没有轻声的使用。在词汇上，口头华语参杂了各类方言甚至非中文的词汇，而且大多取代了普通话中常用的相应词汇，比如“显”取代“郁闷”、“公私”取代“平分”、“巴刹”取代“菜市场”、“refill”取代“续杯”、“geli”取代“恶心”等。语法方面也显示口头华语受了其他语言的影响，如“几粒钟（几个钟头）”、“你去先（你先去）”、“还没来 kok（还没来）”等等。由于口头华语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马来西亚华人说华语时的特色，所以本文所谓口头华语也称“马来西亚华语”。

实际上，其他方言诸如客家话、潮州话及福州话也在古晋市萦绕，惟闽南语和口头华语最通行，几乎所有古晋华裔市民都能理解此二变体。标准华语在古晋市并非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第一语言，不过它藉着播放新加坡、中国和台湾华语影音节目为主的电子媒体管道，散播甚广。如果说古晋市华人对标准华语已了然熟悉，亦不为过。与此同时，粤语在古晋市有着独特的地位。在这里，粤语并非共通方言，然而当地华裔（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它并不陌生，因为粤语已通过无远弗届的电视和电台节目进入这块土地。走在街上，也不难听见不是用粤语交谈的年轻华裔不时随口说出电视节目中耳熟能详的粤语词汇。

这多种中文变体共存的现象，使古晋市成为另一个深具语言态度研究潜能的地点。该市的现实情况，或在当地各华裔籍贯中催生了独特的语言态度。

二、研究方法

此研究旨在探索古晋市网上华裔社群的语言态度。针对此研究，本文为“网上社群”下的定义为“拥有至少一个进行线上事务（如电子银行、电邮往来、对话交流）的网上帐号之群体。”研究锁定的变体为闽南语（古晋口音，下同）、口头华语、标准华语及粤语。变体属性请看表 2。

表 2: 变体属性

	地域共通语	标准语	方言	传媒散播
闽南语	+	-	+	+
口头华语	+	-	-	-
标准华语	+	+	-	+
粤语	-	-	+	+

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为：古晋市网上华裔社群在地位价值（social status）和共聚力（solidarity）这两个维度上，对标准华语、口头华语、闽南语和粤语的语言态度为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为：

- (1) 网上社群；
- (2) 在古晋市居住一个月或以上的华裔居民；
- (3) 14 岁或以上者。

（二）网上社群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网上社群，原因是不少采用配对变法的研究多在学府进行（Obiols 2002）。由于过度依赖学生为受试群（Reddington 2008），造成研究结果不能反映社会上广大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把网上社群定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克服这问题。此社群由各社会群体组成，其中包括了两性、不同的年龄层、教育程度、社会经济阶层等（见 Coupland & Bishop 2007；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04）。如果不把对象锁定为网上社群，要凑集兼具如上特质的受试群是近乎不可能的事。同时，必须承认的是，网上研究固有的局限也是客观存在的，故本研究所得的结果应仅为参考之用。

为了应对同一受试者多次作答的问题，本文参照了 Birnbaum (2004)

的建议，即要求受试者留下电子邮址。要是系统发现同一网络通讯协议 (Internet protocol) 有多次作答的状况出现，即查看受试者留下的电子邮址，藉此推断一人是否多次作答。在实验过程中，受试者也受促仅参与本实验一次。

鉴于人是群居动物，我们可基本肯定在古晋居住至少一个月的受试者有足够的机会与当地入接触交流，继而对古晋的语言生态不感陌生。另一方面，笔者邀请的受试者皆为道地的古晋华裔，再经由他们通知其他古晋华裔参与调查，由此把受试群来源局限在研究范围内。

(三) 受试群最低岁数

一个人到了 12~14 岁才算完整地掌握了其第一语言 (包括语音、词法、句法、词汇、语义等) (Loga Mahesan Baskaran 2010)。至此阶段，他才算是个全方位的 (第一) 语言使用者 (Loga Mahesan Baskaran 2005)。有鉴于此，本研究将受试群的最低岁数定为 14 岁。

(四) 受试群人数

Cohen, Manion & Morrison (2001) 认为，若把误差界限 (margin of error) 及可信度 (confidence level) 各定在 5% 及 95%，则一个为数十万人的群体须有 383 名受试者；而一个有一百万人的群体则须有 384 名受试者。此研究共筹足 403 份有效回复；照上述观点来看，已达到误差界限低及可信度高的标准。我们从受试者自选项得知，他们的社会经济阶层多为中下 (月入 4,000 令吉以下)。

(五) 发音人

本研究采用标准的配对变法，具体实践参考了 Zhang (2009) 及 Cavallaro & Ng Bee Chin (2009) 的报告。发音人的读稿源自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读者投稿，此稿内容及情感皆中立。两名发音人负责个别念出该稿。发音人的遴选标准为：

- (1) 马来西亚古晋华裔;
- (2) 女性;
- (3) 年龄介于 20-30 岁;
- (4) 受高等教育 (本科);
- (5) 在标准华语、口头华语、闽南语和粤语间, 至少能流利地操其中的任何一个。

发音者的国籍和族别需要加以控制, 因为此二者足以影响受试群的评价 (Cargile 等 1994 及 Gallois & Callan 1989, 收录于 Cavallaro & Ng Bee Chin 2009)。此外, 发音者的性别 (Lambert 1967)、年龄、教育程度及使用变体的流利程度也应受控制——性别及年龄将影响发音者的声质 (Zhang 2009), 而教育程度可基本统一发音者的朗读, 继而降低受试群特别针对他们的朗读而做出误判的可能性 (Ihemere 2006)。表 3 列出二位发音者资料及她们所念出的变体。

表 3: 发音者及所使用的变体

发音者	念出的变体
甲 (28 岁, 英语二语教学学士, 操流利闽南语、口头华语及粤语)	闽南语
	口头华语
	粤语
乙 (29 岁, 中文系学士, 操流利标准华语及口头华语)	标准华语

录制的标准华语和口头华语, 无论在发音、词汇或语法上, 都有明显的区别。下面列举数例 (前为标准华语, 后为口头华语): “有时的确有些困难——有时真的会有些难 loh”、“东方人不像西方洋人那么随便——东方人不像 ang mo 酱 cincai”、“对自己的爱人常说我爱你——一直 (入声) 跟自己的男朋友啊 ni (女) 朋友啊讲 I love you”、“也敢向对方说出我爱你——都敢跟别 (入声) 人讲 I love you 的 bor”、“自然成习惯后——讲下讲下习 (入声) 惯 liao har” 等等。

朗读过程中，发音者受促尽可能保持发音力度、语调、语速自然。灌录——审核——重录此三过程重复了数次，直至合适的录音版本出现为止。

(六) 配对实验

受试者首先聆听第一段用闽南语念出的录音。与录音并列出现的，是 14 个要求受试者针对录音者的一些个性特质通过五级李克特量表作出主观判断的问题。量表极左端代表低的极端（如“极丑”），极右端代表高的极端（如“极漂亮”）。此安排旨在避免受试者回答时感觉混淆。量表中出现的个性特质共计 14 个，其中 7 个代表地位价值（受教育、聪颖、成功、富裕、时尚、具创造力、具社交能力），余者代表共聚力（具亲和力、谦虚、大方、诚实、勤劳、可信、诚挚）（Zhang 2009）。实验过程中使用的四段录音，依受试者聆听的先后顺序为闽南语、口头华语、粤语及标准华语。四段录音皆使用同样的问题。

除了主观判断题，此四段录音亦各尾随一份由 10 小项组成的问卷。受试者须针对各小项，通过五级李克特量表作出回应。量表极左端代表非常不同意，极右端代表非常同意。这 10 小项乃为深入探索受试者的语言态度而设。

实验于 2011 年 1 月 30 日至 3 月 4 日间在 kwiksurveys 网上进行，网址为 www.kwiksurveys.com。实验的具体操作方式请参考 Lam & Kamila Ghazali 2013。

表 4：问卷 10 小项详列

小项	标识
如果我说着这女生所用的语言，我会觉得很害羞。	害羞
这女生所用的语言很好听。	好听
如果我会说这女生所用的语言，我会觉得很自豪。	自豪
古晋华人应该用类似这女生所用的语言。	该用

我喜欢这女生所用的语言。	喜欢
参加古晋华人公司的面试时，用这语言者将成功通过面试。	面职
如果用这女生所用的语言跟菜市场小贩说话，他可能会卖我贵菜。	高价
如果我在聊天时用这女生所用的语言，会被人说自我炫耀。	炫耀
用这女生所用的语言，有助于我与古晋华人沟通。	沟通
如果有孩子，我要他们学习这女生所用的语言。	学习

三、研究结果

(一) 受试群对各变体的整体评价

本研究采用的五级李克特量表以一级为最低评价，五级为最高评价；第三级代表中立。评价越高，意即受试群越同意把某一变体和某一特质挂钩，或越同意问卷中的某一小项；评价越低，则受试群越反对把某一变体和某一特质挂钩，或越不赞同问卷中的某一小项。

表 5：受试群对各变体的整体评价

	变 体			
	标准华语	粤语	闽南语	口头华语
整体评价	3.40	3.15	2.92	2.80
顺次	1	2	3	4

表 5 仅展示受试群对各变体的整体评价，而尚未从地位价值和共聚力此二维度作出剖析。放眼一看，标准华语和粤语皆获得高于 3 分的评价。这初步表明此二变体相较于闽南语和口头华语更获受试群青睐；事实上，后二者的评价皆低于 3 分。标准华语显然是获得最高正面评价的变体。这发现是我们所能意料的，而且在多个调查中也曾为个别研究者所提及——Cavallaro & Ng (2009); Coupland & Bishop (2007); Giles & Billings (2004); Hiraga (2005) 都在各自的报告中认为标准变体 (standard variety) 一般是获

得较高的评价的。至于在其余两个获得偏低评价的变体之间，受试群显然对口头华语最为排斥。此变体仅获评 2.80 分，我们暂且把它当作是承受受试群最负面成见的变体。另一方面，闽南语得分仅略高于口头华语，但又不及粤语。如果我们按照古晋市的实际语言应用情况来看，闽南语得分略胜口头华语的现象是合理的；但是此变体的得分少于粤语，就和我们所预期的结果有所出入。如前所述，粤语在古晋市并不常听得见，它在该市的出现主要是依赖马来西亚半岛以粤语为媒介语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所播放的香港戏剧。简单地说，粤语在古晋市就如同电子媒体语言。相反地，闽南语才是古晋市的地道方言。此闽南语得分不及粤语的特别现象在下面将再作相关探讨。

(二) 变体地位价值的评价

变体地位价值的评价是从受试群针对以下七个个性特质的评分中得来的：受教育、聪颖、成功、富裕、时尚、具创造力、具社交能力。此七个个性特质的归类皆依据 Zhang (2009) 报告中的归类法。

表 6：受试群对各变体地位价值的评价

	变体			
	标准华语	粤语	闽南语	口头华语
地位价值评价	3.50	3.16	2.91	2.58
顺次	1	2	3	4

一般上，无论是标准变体的使用者与否，大众在给标准变体的地位价值维度评分时，标准变体的得分会比其他变体来得高 (Zhang 2009: 152)；此研究所得亦然。表 6 显示，标准华语依旧排在第一顺次。其地位价值的评价为 3.50 分，此评价与它在整体评价中的得分 (见表 5) 几乎相同。我们知道，标准华语具有发音合乎规范及用字标准的特点。这特点使到语言使用者很容易对它建立起正面成见，认为此语可促成上向社会流动 (upward social mobility)。就马来西亚的情况而言，能流利操标准华语者，

多是受了高等教育、见识宽广的一群。说着标准华语的电台主持人，往往通过他们知性的言谈和分享，在听众中留下正面印象。此外，作为全世界华人社会的标准语，标准华语亦具有强大的渗透力，以各类管道（如教育和媒体）为中介，打入普罗大众的心中，致使它实用（instrumental）的地位稳如泰山。简而言之，尽管标准华语在马来西亚并不被赋予国语地位，但它在受试群心目中显然具有颇高的地位价值。

表5和表6有个共同点，即各变体的顺次相同。不同的是，在表5中得分较高的变体（标准华语和粤语）在表6的得分更胜一筹；在表5中得分较低的变体（口头华语和闽南语），其得分在表6则更为低下。这意味着在古晋市作为电子媒体语言/外来语言的粤语得分高的现象更值得本文探讨。有两种说法或许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这现象。其一为：粤语是众多中文变体中，仅在普通话之后最具文化和经济竞争力的变体（游汝杰、邹嘉彦 2009：257）。这为粤语之评价不及标准华语提供了逻辑。粤语的强项可从五大方面来看：(1) 学习粤语的人数逐渐增加；(2) 粤语的使用地域范围渐广；(3) 与其他中文变体比较，粤语渗入普通话的词汇最多；(4) 粤语具有较多的社会功能，如流行曲、戏剧、新闻报告等；(5) 粤语是最时尚及多数人争相模仿的变体（游汝杰、邹嘉彦 2009：257）。尽管在这五大项中，和古晋市相关的可能只是第(4)及第(5)项，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粤语在古晋市的扎根确实依靠这两大项。另外一个解释则与 Hiraga (2005：302) 的建议有关。Hiraga 认为，相对于日常生活中常听到的语言，语言使用者可能更容易被某个较为陌生的语言所吸引。原因是此陌生语言一般上不会和该语言使用群的社会阶级挂钩，继而不会让他们对该语言存有负面成见。

这第二个解释如果是可靠的，那么它也一併回答了为什么闽南语和口头华语在地位价值方面得分偏低。在古晋市，闽南语和口头华语是如此地普遍流行，以致受试群可能在潜意识中把这二变体的使用者和某个社会阶级扯上边。有鉴于此研究的受试者多为中下阶级，他们的社交范围估计也是在中下阶级内。由此我们可以假设，他们的社交范围加之以所使用的闽南语和口头华语，多少会影响他们对此二变体的态度。与此同时，闽南语

的得分比口头华语略胜一筹，提出了受试群认同闽南语在古晋更具主导地位之可能。换句话说，和本研究的其他三个变体比较，口头华语在古晋市被视为相对弱势，其使用者也就被视为相对不具权威（less prestiged）。

（三）变体共聚力的评价

变体共聚力的评价是从受试群针对以下七个个性特质的评分中得来的：具亲和力、谦虚、大方、诚实、勤劳、可信、诚挚。此七个个性特质的归类皆依据 Zhang (2009) 报告中的归类法。

表 7：受试群对各变体共聚力的评价

	变体			
	标准华语	粤语	闽南语	口头华语
共聚力评价	3.31	3.15	2.92	3.02
顺次	1	2	4	3

受试群对各变体共聚力的评价可谓出乎所料。语言态度研究基本认同这一点：某语码若在共聚力维度获得高的评价，即意味着它在其使用群中能够带来很强的凝聚力。不少前人研究（如 Hiraga 2005; Garrett, Coupland, & Williams 2003; Kalmar, Zhong, & Xiao 1987）发现在共聚力维度获得高评价的语码多为当地的非标准变体。然而这概论似乎并不怎么适用于古晋市的情况，因为数据显示当地的两个非标准变体——口头华语和闽南语在共聚力维度所获得的评价皆不及标准华语，甚至粤语。口头华语和闽南语不论在地位价值或共聚力维度所获得的偏低评价，或许可以套用 Labov (2006: 329) 的“言语自贬论”（linguistic self-hatred）来作解释。Labov 在其研究中发现很多纽约市居民不喜欢自己的纽约变体，继而提出这论说。在古晋市，口头华语和闽南语由于是当地语言而招惹居民厌烦的现象或许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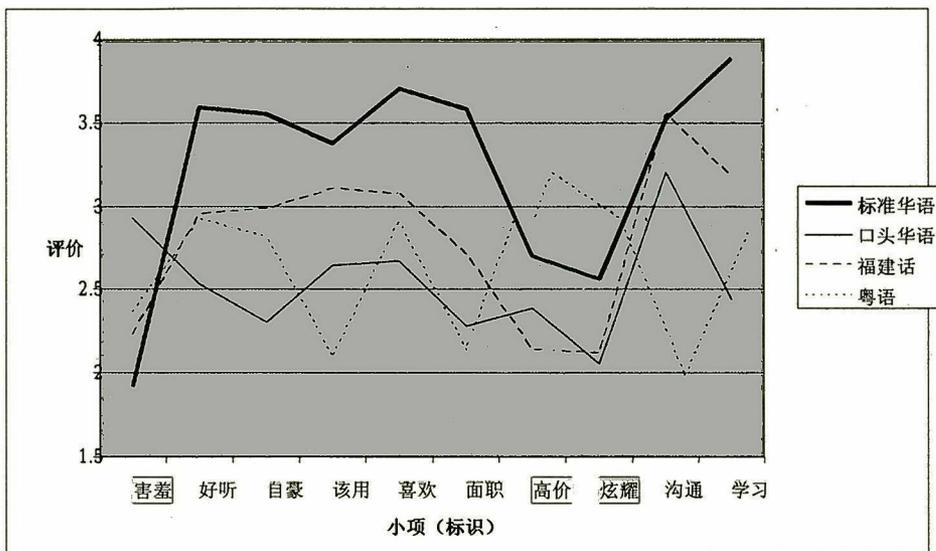
然而，尽管口头华语和闽南语在地位价值和共聚力获得低评价，但是此调查结果依然蒙蔽不了一个事实：当地语码在共聚力维度的得分确是高

于其地位价值维度的得分。从表 6 及表 7 我们可看出,口头华语的得分取得长足的跃进 (2.58 跃至 3.02)。此外,口头华语在共聚力维度的得分胜于闽南语,说明了受试群相对赞同口头华语是联系他们彼此感情的语码。

虽然标准华语和粤语在共聚力维度的得分领先于当地变体,但是它们的得分降低了。至于为何当地变体在共聚力维度的得分依然是低于标准/外来变体,更深入的探究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就此阶段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先参考 Giles 等 1974 所提出的“加诸基准假说”(Imposed Norm Hypothesis)。据此假说,某个被认定为具权威的、具影响力的变体会给语言使用者带来压力。此压力将反过来致使该变体进一步地、全方位地备受崇尚。此假说为标准华语和粤语在研究的两个维度得分偏高的现象定下了逻辑。对标准华语而言,其情况可说是不言而喻,因为它具有标准语地位,不难获得正面评价;但粤语的情况就比较特殊。古晋市的居民一提起马来西亚的首府吉隆坡,很容易就会联想到粤语,因为粤语是吉隆坡华裔居民具主导性的共通语(游汝杰、邹嘉彦 2009: 127; Wang 2006: 307; Sew 2008: 73; Kwan 1991: 4; Platt 2006)。同时,吉隆坡也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中心。由于和吉隆坡紧密挂钩,粤语的地位很自然地就扶摇直上。再加上粤语通过各类媒体管道的渗入,也使其社会价值提高了。因此,要是“加诸基准假说”是符合古晋市的实际情况的,那么粤语在共聚力维度得分高于当地变体的调查结果是合乎情理的。

(四) 问卷调查结果

这部分旨在对受试群的语言态度作更深一层的探索。在问卷调查的进行过程中,受试群受促针对 10 小项通过五级李克特量表作出回应。回应级别越高,表示受试群越同意问卷中的某一小项;回应级别越低,表示受试群越不赞同问卷中的某一小项。本文仅报告相对突出的调查结果。



图片 1: 问卷调查结果

问卷中的“害羞”、“高价”及“炫耀”是负面项 (negative statement)。从图片 1 可看出,除了粤语在“高价”项被评高于 3 分之外,受试群在这三小项中的回应基本是低于 3 分的。这意味着受试群普遍上不认同:

- (1) 他们在说着某一个变体时会感觉害羞;
- (2) 如果他们某个变体跟菜市场小贩说话,他们可能会买得贵菜(粤语除外);
- (3) 如果他们在聊天时用某个变体,会被人说自我炫耀。

由此可见,粤语在古晋市的确被视为外来语言;说粤语的人在古晋市会被视为外地人。这推论是有迹可寻的——在“该用”、“炫耀”及“沟通”项中,受试群具体地表明了如下观点:

- (1) 粤语不是古晋华人常用语;
- (2) 在聊天时用粤语有自我炫耀之嫌;
- (3) 在古晋市用粤语无助于华人间的沟通。

另一方面,受试群认为闽南语的使用最不会致使说话者被菜市场老板

卖予贵菜（见“高价”项）。这表示闽南语是具有社区语地位、有共聚力的变体。此外，闽南语也被视为最有助于古晋市华人沟通的变体（见“沟通”项），以致它在面职时的实用性远胜于口头华语（见“面职”项）。

有趣的是，尽管口头华语是受试群公认为最不表现自我炫耀的变体（见“炫耀”项），可是它同时竟也是他们觉得说起来最害羞的变体（见“害羞”项）。看来受试群的态度还是具有一定的矛盾的。说来最自然的变体反而不是最让他们深感自豪的变体。

标准华语在问卷中四小项，即“好听”、“自豪”、“喜欢”及“学习”项的得分是最高而且是最稳当的；而在同样的四小项中，口头华语的得分则是最底的。若再细看之，我们发现标准华语在这四小项中的得分皆高于3分，而口头华语则是低于3分（粤语和闽南语的得分亦在3分左右）。可以说受试群对标准华语持有相对高的评价，把其他变体远远抛在后头，尤其是口头华语。

调查结果也显示，尽管受试群认为古晋市华人应当用某个变体，但这并不能与他们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学习的语言混为一谈。把受试群针对“该用”和“学习”项的反应并排比较，即可得此结论。从“该用”项的反应中我们发现，尽管受试群认为粤语及口头华语不应该为古晋市华人所使用，但是他们相对愿意让孩子学习粤语（而不是口头华语，见“学习”项）。至于标准华语和闽南语，受试群大体认同此二变体作为古晋市华人的沟通语言。他们亦认为自己的孩子应当学习标准华语和闽南语。

四、结论

本文报告了古晋市网上华裔社群对该市四个主要中文变体的语言态度。研究结果呈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通过配对实验——语言态度研究的间接法，我们发现标准华语和粤语不论在地位价值维度或共聚力维度都获得较高的评价；通过问卷调查——语言态度研究的直接法，则发现口头华语和闽南语的共聚力其实不仅存在，事实上它在古晋市华裔居民间扮演的实用性角色更是不容漠视的。

大而言之, 问卷调查的结果和配对实验的结果是一致的。

针对性而言, 标准华语不论从其内在或外在皆被受试群视为一个独占鳌头的变体, 这超凡的地位是其他三个变体目前无法享有的。其非标准变体——口头华语虽然被普遍公认为古晋市华裔间的沟通语, 但它在更多方面不只很显然地被投以偏见, 其地位甚至不能与外来变体——粤语同日而语。受试群矛盾的语言态度于此可见一斑。至于闽南语则是在古晋市享有社区语这独特地位的变体。

参考文献

中文

- 曾少聪 2002。〈海外华人族群的内部关系〉。载《海外华人研究论集》。郝时远编。
游汝杰、邹嘉彦 2009。《社会语言学教程》。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郭熙 2004。《中国社会语言学》。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外文

- BIRNBAUM, Michael H. 2004. Human research and data collection via the Internet. *Annu. Rev. Psychol.*, 55: 803-832.
-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04. Voices. Retrieved on 11 January 2011 from <http://www.bbc.co.uk/voices/>
- CAMPBELL-KIBLER, Kathryn 2008. I'll be the judge of that: Diversity in social perceptions of (ING). *Language in Society*, 37: 637-659.
- CAVALLARO, Francesco and NG, Bee Chin 2009. Between status and solidarity in Singapore. *World Englishes*, 28(2): 143-159.
- COHEN, Louis, MANION, Lawrence and MORRISON, Keith 2001.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Falmer.
- COUPLAND, Nikolas and BISHOP, Hywel 2007. Ideologised values for British accents.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1(1): 74-93.
- DAILEY, Rene M., GILES, Howard and JANSMA, Laura L. 2005. Language attitudes in an Anglo-Hispanic context: the role of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5: 27-38.
- EDWARDS, John 1983. Language attitudes in multilingual settings: a general assessment.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4(2&3): 225-236.
- GARRETT, Peter, COUPLAND, Nikolas and WILLIAMS, Angie 2003. *Investigating*

- Language Attitudes: Social meanings of dialect, ethnicity and performance*.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 Ghazali Yusri, Nik Mohd Rahimi and Parilah M. Shah 2010. Sikap Pelajar Terhadap Pembelajaran Kemahiran Lisan Bahasa Arab Di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UiTM). *GEMA Online Journal of Language Studies*, 10(3): 15-33.
- GILES, Howard and BILLINGS, Andrew C. 2004. Assessing language attitudes: speaker evaluation studies. In *The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edited by A. Davies and C. Elder. Oxford: Blackwell.
- GILES, Howard, BOURHIS, Richard, TRUDGILL, Peter and LEWIS, Alan 1974. The imposed norm hypothesis: a valid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0(4): 405-410.
- HIRAGA, Yuko 2005.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s six varieties of English in the USA and Britian. *World Englishes*, 24: 289-308.
- IHEMERE, Kelechukwu U. 2006.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Attitudes and Change in Nigeria: The Case of the Ikwerre of Port Harcourt City. In *Selected Proceedings of the 36th Annu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Linguistics*, edited by O. F. Arasanyin and M. A. Pemberton.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
-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2000. *Banci Penduduk dan Perumahan Malaysia: Penduduk Warganegara Malaysia mengikut kumpulan etnik terperinci Cina, jantina dan kumpulan umur*. Malaysia: Putrajaya.
-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2010. *Banci Penduduk dan Perumahan Malaysia: Penduduk mengikut jantina, kumpulan etnik dan umur, Sarawak, 2010*. Retrived on 22 December 2010 from <http://www.epu.gov.my/populationandlabourforce>
- KALMAR, Ivan, ZHONG, Yong and XIAO, Hong 1987. Language attitudes in Guangzhou, China. *Language in Society*, 16(4): 499-508.
- KWAN-TERRY, Anna 1991.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NUS Press.
- LABOV, William 200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LAM, Kai Chee and Kamila Ghazali 2013. Kaedah Inovatif Dalam Kajian Sikap Bahasa. *Jurnal Bahasa*, 28: 77-99.
- LAMBERT, Wallace E. 1967. A social psychology of bilingualism.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3(2): 91-109.
- LAMBERT, Wallace E., HODGSON, R. C., GARDNER, R. C. and FILLENBAUM, S. 1960. Evaluational reactions to spoken languag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44-51.
- LINDEMANN, Stephanie 2003. Koreans, Chinese or Indians? Attitudes and ideologies about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7(3):

- 348-364.
- Loga Mahesan Baskaran 2005. *A Linguistic Primer for Malaysians*. KL: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Loga Mahesan Baskaran 2010. *Linguistik Am: TXGA 61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Universiti Malaya.
- OBIOLS, Marina S. 2002. The Matched Guise Technique: a Critical Approximation to a Classic Test for Formal Measurement of Language Attitudes. *Noves SL. Revista de Sociolingüística*: 1-6.
- PLATT, John T. 2006.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 language policies and relationships. In *World Yearbook of Education: Education of Minorities*, edited by J. Megarry, S. Nisbet and E. Hoyle. Oxon: Taylor & Francis.
- REDDINGTON, Elizabeth 2008. Native Speaker Response to Non-Native Accent: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in TESOL & Applied Linguistics*, 8(2): 1-27.
- SEW, Jyh Wee 2008. From South Asian Echo Formation to Cantonese Phonetic Repeti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Society and Culture*, 24: 72-83.
- TAN, Chee Beng 2000. Socio-cultural Diversities and Identities. In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edited by Kam Hing Lee & Chee Beng Tan. Shah Al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IEN, Ju-K'ang 1953. *The Chinese of Sarawak*. London: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 TING, Su Hie and PUAH, Yann Yann. 2010. *Young Hokkien speakers' pride in their ethnic language and Mandar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nority and Majority: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Kuching, Malaysia.
- WANG, Xiao Mei 2006. *Different medium of instruction, different destiny of language shift? A pilot study in Kuala Lumpur*. The 11th Conference of Pan-Pacific Association of Applied Linguistics. Tokyo: PAAL Japan, 307-317.
- YOUNG, Colleen E. 2003. College Students' Reactions to Accents of L2 Learners of Spanish and English. In *Selected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Workshop on Spanish Sociolinguistic*, edited by L. Sayahi.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
- ZHANG, Qi 2009. Hong Kong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Varieties of English. *Newcastle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5: 151-173.

附录

发音人读稿

“我爱你”三个字看来非常简单，但是要随便从一些人的口中喊出来，有时确实有些困难。因为东方人不像西方洋人那么随便，他们时常把 I love you 挂在嘴边，不但对自己的爱人常说我爱你，就算首次见面的美女，他也敢向对方说出我爱你。自然成习惯后，就造成洋人太过开放、太过随便，“爱”字就变成没什么价值了。坦白说，我对家人从来也不曾说过“我爱你”三个字，因为我爱他们是用内心、真诚及呵护的心去爱护他们。所以，我与家人时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好像一班很要好的朋友，心灵百分百沟通，没有任何隔膜感。这一路走来，许多邻居以为我只关心家庭而不爱国，因为我们一同走过了几十个国庆日，我也从未在车上或住家门前插过国旗。可是内心却非常深爱马来西亚这美好的祖国，只是我认为没必要大喊大叫。

(选自 2010 年 9 月 29 日《星洲日报》副刊)